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弗朗茨·博厄斯¹著 沈倩² 龚俊安³ 廖其和⁴译

【摘要】弗朗兹·博厄斯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是人类学应用于现代议题的开山之作。博厄斯以文化相对主义与历史特殊论为核心理论框架，系统批判了20世纪初西方社会盛行的种族主义、欧洲中心论及生物决定论。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博厄斯有力论证了“种族”乃社会建构而非生物实体，并深入驳斥了以此为基础的优生学与犯罪学理论，从而为种族平等与民族平等思想奠定了科学基础。该著作不仅颠覆了当时主流的进化论与传播学派，更开创了人类学的实证主义与应用研究传统，对塑造现代人类学的学科方向与核心价值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博厄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种族

1 作者弗朗兹·博厄斯（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美国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之一，开创了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代表性著作有《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原始人的思维》、《种族、语言与文化》等。

2 译者沈倩，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箱：shenq33@mail2.sysu.edu.cn

3 译者龚俊安，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箱：gongjan3@mail2.sysu.edu.cn

4 译者廖其和，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箱：liaoqh9@mail2.sysu.edu.cn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Franz Boas¹ Shen Qian² Gong Jun'an³ Liao Qihe⁴

【Abstract】 Franz Boas'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is a pioneering work that applies anthropology to contemporary issues. Boas, with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historical particularity as his core theoretical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criticized racism, Eurocentrism and biological determinism that were prevalent in Western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rigorous empirical analysis, Boas compellingly argued that "race" is a social construct rather than a biological reality and thoroughly refuted the eugenics and criminology theories based on it, thereby laying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the ideas of racial equality and national equality. This work not only subverted the then-dominant evolutionism and the diffusion school, but also initiated the positivism and applied research tradition in anthropology, 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shaping the disciplinary direction and core values of modern anthropology.

【Keywords】 Franz Boas;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Anthropology; Cultural relativism; Race

-
- 1 By Franz Boas, (July 9, 1858 - December 21, 1942),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and one of the pioneers of modern anthropology. He established the four major branches of anthropology (physical anthropology, linguistics,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etc.
 - 2 Translator Shen Q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shenq33@mail2.sysu.edu.cn
 - 3 Translator Gong Jun'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gongjian3@mail2.sysu.edu.cn
 - 4 Translator Liao Qi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liaoqh9@mail2.sysu.edu.cn



引言

“美国人类学协会谴责当前在美国出现的关于黑人在生物学和先天智力上低于白人的言论，并重申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证明应将任何种族排除在美国宪法保障的权利之外。机会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与所有已知的人类生物学知识相容。所有种族都具备充分参与民主生活和现代技术文明所需的能力。”

——1961年11月17日，美国人类学协会会员理事会年会决议

1961年11月17日，美国人类学协会会员理事会在“美国民主摇篮”费城的会议上通过了这项决议，再次给将民主视为道德问题、为平等和博爱奋斗的人士提供了科学支持。在这个种族主义幽灵又一次在外游荡的历史时刻，重新以普及本形式发行由弗朗茨·博厄斯撰写的关于种族和文化的权威著作，尤为幸运且适时。博厄斯是为人类学关于这一当代重大问题提供概念框架和科学基础的核心人物，他在从事种族和文化研究三十余年，写下了《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作为其信仰的宣言。他早期关于同一主题的作品曾被翻译成德文，最终成为纳粹重点焚毁的书目。

当博厄斯在十九世纪末刚刚转向人类学时，“民族志”主要是未经训练的观察者和旅行者对原始人的非系统性观察，而“民族学”则主要是对文明历史的猜测，很少参考实际观察到的事实。这两种研究人类科学的方法都与现代生活的问题无关。只要“野蛮人”被视为不同的物种或人类种族中低等且未开化的分支，就很难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对其奇异习俗的研究也仅仅是出于古物研究者和收藏家的兴趣。然而，博厄斯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学研究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他在1889年时写道：“对（不同家庭结构形式）的研究表明，我们认为是天性的情感反应实际上是由文化决定的。我们很难理解，父子之间的情感关系会与我们习惯上的认知不同，但对不同社会组织形式的人的生活的了解，会让我们发现，其冲突或共同义务的性质与我们熟知的完全相反，违背了我们认为‘天然’的对亲属的情感反应。民族学的数据证明，不仅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情感也是我们社会生活形式和我们所属民族历史的结果。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人类文化的发展，就必须努力摆脱这些束缚……我们必须放下许多自以为显而易见的观点，因为在早期它们并非显而易见。我们无法先验地确定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哪些部分是全人类共有的，哪些是由我们所生活的文化决定的。民族学的数据能够使我们获得这种见解。因此，它也使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待我们自己的文明。”



博厄斯动荡的一生中有许多争议，首先是博物馆藏品的排列。博厄斯坚决捍卫其按照地理和部落进行分类的排列方法，反对传统文物类型排列法的拥护者。他认为博物馆的功能之一是“教育和娱乐”，民族学藏品的陈列应以展示生活方式为目的，而不是科学类型学。他的原则在所有美国博物馆（除了美国国家博物馆）和许多欧洲博物馆中得到了实行。博厄斯运用人类学，向观众展示不同且连贯的生活方式，是其尝试将人们的思想从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众多方式之一。

博厄斯受到孕育了卡尔·舒尔茨和十九世纪哲学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浪漫主义传统的教育。他是典型的新教徒；他最看重自主性，并尊重每个个体的独特潜力。他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通过不懈的努力，可以摆脱迷信和非理性，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中过上理智的生活——尽管他完全明白人类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部分解释了他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坚定不移的反对，后者本质上是悲观的人生观，并认为非理性是人类状态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世），看着仇恨和战争的浪潮高涨，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中。但是，尽管年老和疾病让他感到无助，他对人类的信念从未动摇过。当一位同事谈起他们的学生在大萧条和战争威胁中成长是多么困难时，博厄斯对这位同事说道：“如果我还年轻，我会做点什么。”永远的行动主义者！

对博厄斯来说，“做点什么”总是意味着用他的科学造福人类。他的目标是通过人类学来启蒙人类。尽管他不喜欢公开露面，还因部分瘫痪导致说话困难，他仍不知疲倦地演讲授课。他孜孜不倦地为科学期刊和大众媒体撰稿，并经常写“给编辑的信”。作为一名教师，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他使人类学在美国成为一门学科。他在克拉克大学的学生亚历山大·F·张伯伦获得了美国大学授予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学位，此后四十余年的几乎所有美国人类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博厄斯的影响。他早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中有许多杰出的人类学家，如阿尔弗雷德·L·克鲁伯、罗伯特·洛伊、亚历山大·戈登威瑟、爱德华·萨皮尔、克拉克·威斯勒、保罗·雷丁和莱斯利·斯皮尔。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师从博厄斯的包括露丝·本尼迪克特、玛格丽特·米德、梅尔维尔·J·赫斯科维茨、奥托·克兰伯格，还有许多名气稍逊的学者，他们后来在世界各地建立院系、开展研究。作为一名教师，博厄斯是一位严厉的监管者，从不向无知妥协。他不给学生们提供阅读书单或其他辅助工具；他在生物统计学课程的开头说：“我假定你们都懂微积分。如果不懂，就去学。”在他的研讨会上，他指定荷兰语或葡萄牙语的书籍；没有学生敢对



博厄斯说：“我不懂荷兰语。”学生总能学会如何解决。博厄斯很少就论文的主题提建议；一个学了两年人类学却没发现自己想研究的问题的学生不值得费心。他会和学生讨论一般问题，但不会批评或考察未完成的工作。他的批评很简洁——“你完全错过了重点”——他几乎从不表扬。学生必须坚强、独立、专注才能坚持。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老师，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然而，尽管他表面上很冷漠，但他深切关心他的学生、他们的生活和事业，但一般都是从他认为对他们有益的角度出发。尽管他重视自主权，但他经常专横行事。他不与学生商量就为学生安排实地考察和工作，且如果学生拒绝接受他的安排他会非常难过。但无论他多么不赞成学生，他对学生的真心从未动摇。而他的学生，尽管其中一些人因理论和个人原因与他发生激烈争吵，也从未失去对他的尊重和爱戴。一种团队精神将这个共同奋斗建立科学和传播思想的团体团结在一起。今天很难复制将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同学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博厄斯认为需要启蒙的领域之一是种族问题。在前文引用的早期论文中，他指出需要区分一个民族先天遗传的生物特征与该民族作为其文化的一部分后天获得的特征。这个问题是他毕生的研究；它也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的核心主题。每当他研究人类体型分布、民族特征、犯罪、儿童生长和成熟速度时，他都会通过精心设计的研究，努力将人类的文化习得特征与先天禀赋区分开来。他以历史为证，始终坚持举证责任在那些将差异归因于生物原因的人身上。博厄斯受过自然科学的训练；他从物理学训练中带入人类学研究的并不是一种特定的方法，因为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意识到，一门学科的方法不能应用于另一门学科，社会科学的表述方式必须与实验科学的表述方式不同。他为人类学带来了严格的证明标准、对所有概括的批判性怀疑，以及一种物理学家的态度——即任何概括或解释需要清楚地证明没有其他解释可能成立，否则只能被视为一种有用的假设。博厄斯理论方法的这一面令他的一些同事尤其厌烦，他们希望有更简单的概括，并将博厄斯的证明标准视为“方法论的束缚”。

在体质人类学领域，他是一位伟大的创新者；他只对活人的研究感兴趣。对化石和骨骼材料的研究是十九世纪体质人类学的重要部分，但他并不感兴趣。他不满于当时对种族的定义，不论是选择极端形式作为“纯”类型的还是粗略统计“平均值”的。他用特定时空下的人群取代“种族”这种模糊的实体作为研究单位，从而预示了遗传学的当代趋势。他对人类类型不稳定性的研究（参见由博厄斯撰写、美国移民委员会 1911 年发表的报告



《移民后裔的身体形态变化》)沉重打击了种族特征不变的理论。他的结论引起了批评风暴，但后来得到了充分证实。他对儿童成长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引入的生理年龄（区别于实际年龄）概念影响了儿科和教育；他对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儿童的研究，尤其是对孤儿院儿童智力迟钝的观察，对改变儿童保育计划和采用寄养家庭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强调家族血统而非种族是遗传机制，从而为个人主义奠定了科学基础。种族平等并不意味着个人相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其特定遗传的产物，只有同卵双胞胎才拥有相同的遗传，也是其生活经历（包括其文化）的产物。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每个人，无论肤色、阶级或性别，都有权平等地享受其文化的馈赠，并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潜力。博厄斯以科学的名义发表了他的人权宣言。

首次造访爱斯基摩人时，博厄斯就直观地感受到了人类文明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事物的变化越多，不变的成分就越多。对于爱斯基摩人，他这样写到：“在与他们亲密地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怀着悲伤和遗憾的心情，离开了这群北极圈的伙伴们。我发现，他们也有在享受生活，尽管生活可能比较艰苦，就像我们一样；自然于他们而言，也是美丽的；友谊的感情，也深深扎根于爱斯基摩人的心中；尽管他们的生活与城镇生活比起来显得非常野蛮落后，但他们和我们一样，也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感情、美德和缺点都是基于人性的，就像我们一样。”¹

文化人类学的两个方面始终存在于在博厄斯的思想和写作中：即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统一性和人类文化基本模式的普遍性；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生物特征，以及人类在时间和历史带来的各种突发事件中生存并解决问题过程中所展现的聪明才智。

但是，博厄斯并不是那种认为没有道德绝对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例如，吃掉邻居这个行为，它并不因为爱斯基摩人出于需求或巴布亚人出于宗教信仰而变得可以接受或理所当然。这些习俗在它们所处的特定文化环境中有其功能。人类学家必须以生物学家观察老虎捕食习性的同样客观性来研究这些现象——老虎并不像人们刻板印象中的那样如此具有掠食性。但因为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与我们人类息息相关，并且在更深层意义上是彼此的守护者，在不混淆道德感受的前提下实现这一客观性质并不简单。我们不必每天面临饥饿的威胁；我们没有被教导，土地需要人们鲜血的滋养才能孕育生命。我们可以珍惜每一个人类的生命。

1 引自 1953 年《弗朗茨·博厄斯：人类学的形成科学》，梅尔维尔·J·赫斯科维茨。



关于博厄斯的一大误解是他是反进化论者。诚然，他的确反对十九世纪以文化中心主义为中心的文化进化论——即人类从“野蛮”阶段逐步进化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而所有现存的文化形式都应根据其与这种最高进化级别文化（即英国）的相似和不同程度来评判。但是，他相信文化进化论，所有观察地球漫长历史的人肯定都相信进化论。他试图纠正的只是不恰当的方法，以及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他不仅相信进化论，他还相信进步——尤其是在人类活动的两个领域：一是随着知识的增长及其技术的推论和人类对环境日益增强的控制，二是人类对其侵略性逐渐增强的控制，这使人类能够与越来越多的同伴和平共处。现存大量关于灵长类动物行为的资料，博厄斯在当时可没法获取，这些资料记载了动物世界中维护动物群体内以及动物群体之间和平的方式。他分享了十九世纪对于动物世界“以牙还牙”的看法，并将早期人类视为在不断冲突中的状态。但他正确地认识到，不断扩大群体规模这一趋势，不仅是科学进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必要条件。1928年，他看到下一个不可避免的步骤是全体人类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使他们之间的竞争站不住脚。博厄斯于1942年去世，当时原子弹还没有落在广岛，人类自我毁灭能力的发展，促成了新社会体系的形成，在这个体系中，战争被禁止，因为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及其前作《原始人的心智》都不是做作的书；两本书既没有充斥行话，也没有卖弄学问；尽可能少地使用描述性和例证性材料。但两书都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如果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现在看起来显而易见，那是因为，这些观点在成书后的三十多年里，已经成为我们思维的一部分。然而，老旧的思维方式很难消亡，挥之不去。1961年，美国人类学会有必要重申其对种族平等的立场。许多人认为，只有与我们的社会制度相似的社会制度才值得支持；只有那些与我们持相同观点的人才应该分享大自然赐予这个国家的财富。当我们面对非洲和亚洲的新兴国家时，我们必须回顾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并展望其进化的下一步。

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

1962年1月15日

露丝·本泽尔



第一章

何为人类学

人类学一般被认为是描述异域人士特殊相貌、奇异风俗和信仰等一系列稀奇事物的学科。人们将人类学视为一种娱乐消遣，而这种消遣，似乎与文明社会的生活行为毫无关联。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我想证明的是：对人类学原理的清楚认识，有助于阐释我们当前时代的社会进程，如果我们愿意倾听并接受其指导，人类学或许能够指导我们应该做什么和应该避免什么。

为了证明我的论点，首先，我必须简要解释一下人类学家的工作。

看起来，人类学的领域，即“人类的科学”，似乎早已由其他一系列学科占据。研究人体形态的人类学家面临解剖学家的挑战，后者已经花费数个世纪研究人类的整体形态和微观结构。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投身于人类身体和大脑功能的研究。那么，人类学家还有什么正当理由来声称，他们能够丰富我们的知识储备呢？

其实，人类学家的职责，与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要有所不同。那些学者的研究主体是人体和心理的典型形态和功能。而那些表现在各个群体中的细微差别，要么被忽略，要么被视为与该类型无关的特殊情况，并未得到重视，尽管有时这些差别暗示了其从较低形态进化而来。他们的研究中心，向来集中在个体作为一种类型上，以及从形态学、生理学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其外貌与功能的意义。

相反，对人类学家而言，个人只有作为种族或社会中的一员时，才显得重要。个体间差异的分布和范围，以及每个个体所属群体所决定的特征，都是人类学家调查研究的对象。而解剖特征、生理功能和心理反应的分布，都是人类学家研究的主题。

可以说，人类学并非单一的科学，因为人类学家以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为前提，并将其应用于群体研究。所有这些学科，都可以并且正在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人类学家的关注重点始终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我们会测量体重和身高，以此调查某个种族或社会群体的体型分布情况。个人只有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才具有重要价值，因为我们只对决定群体中形态或功能分布的因素感兴趣。生理学家会研究剧烈运动对心脏功能的影响，人类学家则利用这些数据，调查一般生活状态下群体中导致剧烈运动的因素。人类学家的研究兴趣，是这些因素对构成群体的个人之间或整个群体在形态、机能和行为分布上的影响。



个人作为种族或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成长和行动。他的身体形态由遗传和他所生活的环境决定。身体机能既受体格的限制，也取决于外部环境。如果某个群体选择或必须完全以肉食为生，他们的身体机能将与其他同样体格但以纯素食为生的群体有所不同；或者，反过来说，以相同方式养育的不同种族群体可能在生理行为上表现出某种相似性。

许多例子表明，本质上具有相同血统的人在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中有不同的表现。西部高原文化简单的印第安人，与同种族但社会组织更加复杂的古墨西哥人拥有不同的心理反应。欧洲的农民与大城市的居民不同；美国出生的移民后裔与其欧洲祖先不同；挪威的维京海盗与美国西北部的挪威裔农民不同；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公民与帝国时期堕落的后代不同；革命前后的俄罗斯农民也不同。

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现象可以用个体的、非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因为其在理论上似乎可以把个人分离出来并阐释形态和机能变化的问题，以至于能明确排除社会或种族因素。然而，在所有基本的社会现象，比如经济生活、群体的社会组织、宗教观念和艺术之中，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能的。

心理学家可能想要研究艺术创作的心理过程。尽管这些过程在各地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创作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在研究的不仅仅是单纯作为创作者的艺术家，还包括艺术家对其生活文化的反映，和同行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应。

试图揭示经济过程的经济学家必须以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个人。对社会组织的研究者来说也是如此。以纯形式的观点、通过详细分析说明其背后基本概念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组织是可能的。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这是研究这种组织在个人和群体生活中所体现的动态影响的起点。

语言学研究者会研究特定时间的语言表达“规范”、导致语音变化的机械过程、语言中表达的心理态度、以及引起意义变化的条件。而人类学家更关注语言现象的社会意义、作为交流手段的语言，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简而言之，当讨论个人对其同伴的反应时，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所生活的社会上。我们不能将个人视为孤立的单元，而必须在其社会背景中研究他。问题在于，通过归纳总结，有没有可能发掘到综合社会数据与个体生活的形式和表现之间的功能关系；换句话说，是否存在任何普遍有效的法则在支配着社会生活。

这类科学探究只关注观察到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物理学和化学关注物质（在



我们的感知内)平衡和运动的形式,探究到的知识是否有用则无关紧要。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聚焦于加深对外部世界复杂性的理解,一项发现的价值只体现在为这些科学的一般问题提供新的启示,经验是否适用于技术问题则与他们无关。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无价之宝,未必对他们有吸引力;我们日常工作中的无用之物,或许对他们无比贵重。对于发现,纯科学所能接受的唯一评价标准是它们对解决一般抽象问题的重要性。

虽然这种纯科学的观点也适用于社会现象,但很容易认识到,这些现象与我们自己更直接相关,因为几乎每一个人类学问题都涉及到我们最私密的生活。

一群儿童的发展过程取决于他们的种族血统、父母的经济状况和他们的总体身心健康。了解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掌握这群儿童的生长状况,并确保他们拥有尽可能好的生活条件。所有生命统计和社会统计数据都与要采用或要放弃的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很难注意到,如果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对我们这些问题的关注其实与我们赋予结果的现实价值无关。

后续章节将根据从纯粹分析角度进行的人类学研究的结果来讨论现代生活中的问题。

为此,有必要明确两个基本概念:种族和文化稳定性。这些将在相应的章节详述。

(责编:王儒蕴)